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苏〕叶尔米洛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 ЕРМИЛОВ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根据苏联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译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苏〕叶尔米洛夫 著

满 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375 插页 3 字数 223,700

1985 年 2 月新 1 版 198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200 册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

书号: 10188·525 定价: 1.25 元

目 次

作者的话.....	I
引言.....	1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	28
《穷人》、《二重人格》、《女房东》、《脆弱的心》、《普罗哈尔钦先生》及其他	
六十年代上半期的作品.....	90
《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地下室手记》及其他	
《罪与罚》.....	156
《白痴》.....	186
《恶魔》.....	220
《少年》.....	229
《卡拉马卓夫兄弟》.....	250

引 言

高尔基认为在艺术描写力方面只有莎士比亚能与之媲美的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他的作品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剥削社会中的无限苦难和对这些苦难所感到的无限隐痛。但同时，他剧烈地反对寻求从侮辱与损害中解放人类的任何实际斗争道路。

内心分裂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他和他笔下人物的一种独特的、痛苦的和具有报复性质的陶醉的源泉，这是承认痛苦没有出路的一种病态形式。

他自己也是被可怕的现实残酷地侮辱与损害了的，这个现实使他的人物成为满身疮痍的人。他的生活与文学的道路是一种最深刻的悲剧，那内容是：人的灵魂被敌视天才、自由、艺术和美的现实所压制和毁损。在这位极度主观的作家的永远采取个人自白形式的、充满阴沉的忧虑、热病似的彷徨和动摇、对生活的混乱与黑暗的难以消除的恐惧的作品里，镌刻着一颗伟大然而病态的靈魂的悲伤的历史，这颗靈魂为人类的苦难痛苦，绝望——名副其实地绝望，就是说，丧失了期待、梦想、青春的憧憬——这颗靈魂爱上痛苦，因为除了痛苦，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使它活下去，也就是说，可以使它爱。

他的作品骚乱不安的气氛，反映出针对践踏千千万万人（象把不幸的马尔美拉多夫^①践踏得奄奄一息那样）的现实而发的被

压抑被歪曲的抗议，以及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上并且孕蓄着不可思议的震荡和可怕的激变的那个社会的朝不保夕、濒于崩溃和必遭灭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俄国封建农奴制度解体并被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的那个过渡危机时期所产生的。

所谓“宗法制的”、农奴制的俄国正在分崩离析，摇摇欲坠。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代言的人，在新的、他所不理解的、折磨他的现实里，彻头彻尾是孑然一身，真正是完全孤独的。小官吏；卷入资本主义漩涡并且忍受一切被摒弃之苦的没落贵族；脱离人民生活，脱离先进的贫民阶级民主主义知识界，脱离列宁所说的俄罗斯赖以艰难辛苦获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先进社会理想困难形成过程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濒于无业游民边缘的昨天“宗法制”的小市民；孤单单住在“街灯象出殡的火把般摇曳着”的城市贫民窟昏暗陋巷中的形似橱柜、箱子或棺材的斗室里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屈服在双重的社会压力之下。

农奴制度，果戈理笔下发号施令的要人们的横暴和专制压迫着他；同时，新关系的成长，掠夺行为的普遍猖獗，狼样凶残的生活法则的无耻也窒息着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了这些动荡不定的，在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毫无武装，毫无防御，容易受到各种反动的和颓废的影响的社会阶层对资本主义胜利行进所感到的畏惧，以及他们要找寻随便什么一种社会支柱的痉挛性的尝试。

《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社会结构吓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分裂的主人公，对他加以一贫如洗和完全被生活所排挤的威胁，但同时又诱以高升显达、君临人上的可能；引诱了——又残酷地欺骗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怀着羞耻和憎恶发现自己有沾染资

① 《罪与罚》里的一个人物，索尼娅的父亲。

产阶级不道德行为的内在可能，感觉到“魔鬼般的”诱惑的毒汁侵蚀到他们体内，“蜘蛛的”灵魂在他们身上滋长。他厌恶地摆脱这些诱惑，发现这些诱惑原来是皮笑肉不笑的似人非人的斯维德利加依洛夫^①式的、斯美尔佳科夫^②式的假面具。这种憎恶常常混和着另外一种羞耻——羞愧自己的无能，笨拙，软弱，不能适应幸运和粗暴的力量，不适宜扮演在强盗世界中飞黄腾达的强盗的角色。“不做奴隶，就做统治者”——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为计划中的长篇小说《一个伟大罪人的生活》而写的）里看到了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作为他的创作的题辞。在这句话里，表现着他的主人公的苦闷。

这些苦闷和彷徨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不做奴隶主，就做奴隶，不压迫别人，别人就压迫你！在“主子的道德”和“奴隶的道德”这二种可能性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选择”了第二种。他不具备做“主子”的任何条件；“主子的道德”使他发生生理的厌恶，跟他整个的人性相抵触。宁做牺牲者，不做刽子手！宁被践踏，不压迫别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可能性。新的生活法则的兽性本质暴露在他面前，而俄国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相对进步的方面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脓疮”正象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可怕。他把“无产阶级”有时和深仇宿恨的资产阶级混为一谈，有时又和无业游民混为一谈。革命斗争所导致的结果是被作家所否认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资本主义，也害怕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的日趋成熟，在他看来，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他多年来观察西欧生活所理解到的。

① 《罪与罚》里的一个人物。

② 《卡拉马卓夫兄弟》里的一个人物。

正象列宁所指出，在俄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空想的观念形态中混合在一起——只有从九十年代起，由于赤手空拳的革命斗争过渡到了最革命阶级的斗争，它们才开始分道扬镳。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在他的艺术作品和政论中对革命进行政治攻击，于是就反对了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他年轻时是被他十分珍视的。

（和先进社会力量隔绝的这一点，使作家丧失任何一点现实的希望，只能加强他走投无路和僵滞的、永久的内心分裂的思想和心理而已。）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们，依靠农民革命来给自己寻找出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十年代中曾经跟他们并肩作战过，后来离开了他们——更正确点说，鄂木斯克监狱^①的墙把他带走了，使他和他们隔绝了。

他作为果戈理的优秀传统的继承人和学生，别林斯基的盟友，开始了他的文学道路。他的精神的与文学的发展，如果不被那种万恶不赦的对他人格的愚弄异常粗暴而残酷地打断的话，以后是会不顾早期作品中已经显露的十分严重的矛盾，仍旧朝同一个方向继续下去的。整整二十年，他被那杀害过普希金，杀害过莱蒙托夫，迫害过果戈理的尼古拉统治排斥于生活圈外。

（在这几年中，他怀着一颗病态善感的、赤裸裸的灵魂（名副其实的病态：他在年轻时曾经濒于精神病的边缘；苦役又加重了他的癫痫），经历了痛苦的思想心理过程。）他回到社会与文学生活中来，已经不是去服苦役时候的他了。（他再不相信有通过斗争改善现实的可能，甚至也怀疑“人的天性”，怀疑人有用“自己的力量”、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一八四九年遭沙皇反动当局逮捕，判处死刑，后改判为四年苦役，被囚禁在鄂木斯克监狱中。

自己的理性意志改造生活的本领。他开始在宗教中——在对自己的不断的残酷的斗争中，寻求支持；直到他生命的末日，宗教在他的灵魂中是站脚不稳的，他的灵魂倾向于反叛，愤激，但又不得不把反叛的和无神论的意向压制下去。他在脱离革命阵营之后，在给封·维静娜（一八五四年二月）的信里很确切地讲到自己：

“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到我进棺材的时候，我是时代的孩子，无信仰和怀疑的孩子。这种求信仰的渴望害我受过苦，并且现在还在受着多么可怕的折磨，在我心中，否定的论证越多，这种渴望也就越强烈。”

回到彼得堡，经过了十年极严重的、很少有人这样充分体验过的孤独——灵魂的、精神的、社会的孤独——之后，具有五光十色的矛盾、脓疮、诱惑的资本主义化大城市的生活突然涌现到他的眼前。除了这一大堆汹涌澎湃的印象——后来在《少年》里把那混乱光景刻画得淋漓尽致——之外，不久又加上了同一性质的、但却是无比加强了国外旅行的印象，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状况的印象。于是他更加确信自己的说教，认为现代人只有在苦难中才能够摆脱利己主义，摆脱金钱统治一切的魔鬼般的权力的诱惑——这种说教只能加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生活的重压而已。

资产阶级无政府式的肆行妄为的混乱状态，人对人的压迫，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残酷而折磨人的力量的肆无忌惮的跋扈，普遍的堕落，道德基础的瓦解，卑鄙庸俗的资产者的胜利，贫穷，卖淫，饥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方生活中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只看到同样一些粗野的物质利益的表现，同样为财神服务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使他对“第三等级”避之唯恐不及的。他不能理解，正是在工人阶级身上集中着现代人类的精神美，世界人道主义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他真是“违反理性，不

顾事实”，把“第三”和“第四”“等级”混淆在一般的、被他所痛恨的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中了。

（离开了新的，先进的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的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失掉了帮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力求了解现实的混乱并冲破黑暗的唯一的可能。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类苦难吸入自己的心里，拜倒在这些好象为人类理智和心灵所“不可捉摸”的无边苦难之前，象拉斯柯尔尼科夫^①似地卑躬屈节。他达到了这样一种基督教的爱，赫尔岑对这种爱说过几句严酷而真挚的话，“痛苦的爱可能很强烈，——哭，诉说，然后擦眼泪，主要的是，什么事也不做。”谢德林在跟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一文中）时着重指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同情必须表现为号召他们去向暴力作斗争，而不是表现为“侮辱性的慈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里，借主人公的嘴，对于这种对穷人的侮辱性的慈悲表示了有力的抗议。并且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许多形象也都反对了侮辱性的慈悲！可是，它仍旧不仅侵入他的说教之中，并且也侵入作品的肌体之中，跟抗议和愤慨的基调发生矛盾，力图抵消、压倒这些基调。

（陀思妥耶夫斯基否认在现实的客观历史发展道路上能够找到出路，看不见前途有一线希望，于是开始在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的与经济的落后状态的理想化中寻求解脱。他达到了斯拉夫派的说教，宣扬俄国的“特殊道路”，左西玛^②式的“神圣的平静”（用他自己的说法！），这种说教是用来拯救世界免于资本主义的恐怖和革命的震荡的。

① 《罪与罚》里的主人公。

② 《卡拉马卓夫兄弟》里的一个人物。

他对资本主义脓疮的揭露，是一种从反动的空想的立场出发的批评；实质上，这是一种把历史拉向后退的企图。

陀思妥耶夫斯基屡次承认他从来做随便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克制，在一切事情上面永远是超越限度的。他在给他一个最亲近的朋友亚·尼·马伊科夫的信（1867年）里写道：“……最糟糕的是，我的天性卑劣而又过分热情。随便什么地方，对于随便什么事情，我总是走极端，我一辈子总是超出界线。”作家逝世后，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杨诺夫斯基在写给他的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里回忆道：“……他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夸张过火的东西……”

他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对什么事情怀疑越深，就越是不可救药地、拚命地要说服自己，自己是相信这一点的——连同一切由此产生的即使是最不可置信的结论和后果，不顾一切，甚至不顾现实，相信这一点！这种濒于癫狂的主观主义的特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面貌的鲜明特征，在他的全部创作上留下了烙印。谢德林特别深刻地懂得这种特点，认为《地下室手记》的作者是一个被抑制的真诚的空想家。个人性质的特点，——极端的主观主义，——同时对于观点跟客观历史进程正相违反的反动空想家的社会性格说来，也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觉到在生活前进运动中只有斯美尔佳科夫精神的嚣张，只有对人的掠夺和迫害，只有资产阶级，他企图在生活前进运动中自卫，于是就变成了“正教、专制、国粹”的夸张失实的捍卫者。

然而，来自右方的对资本主义批评的立场，并没有使他在作品中把贵族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可能支柱，恢复农奴制的号召等等来加以维护和理想化。如果从他的作品中把各种各样贵族形象汇集在一起，就无异是对于整个寄生阶级的丑恶腐朽面貌作了歼灭性的分析。我们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对贵族老爷和钱袋怀有本能的憎恶和轻蔑的平民知识分子。

这一切更加尖锐地突出了作家的社会政治立场的真正空想的性质，他痛恨贵族老爷方式，也痛恨资产阶级方式，企图在专制政体里面，也就是说，在日益获得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独裁机构里面寻求对于这二者，同时也是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的防御。当然，只有灰心、绝望，再加上对专制政体的象牢狱墙壁一样不可穿透的绝对力量的幼稚的信仰；只有对沙皇牧歌般动人地跟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对专制政体的“超等级性”、“超阶级性”的牵强离奇的、象暗淡的狂热的火花一样的信心，才能够使作家达到这样一种反动的堂·吉珂德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白痴的形象，那个立场和见解对于作家本人显得特别亲切可贵的孤立无援而不能帮助任何人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希金^①的形象，是跟堂·吉珂德的形象十分相似的。他在灵魂深处觉察到自己的“纲领”的空想本质……为了坚持这种纲领，他不得不对客观现实中的许多事物视若无睹，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安慰并镇定自己的良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热烈欢迎一八六一年的农奴制改革，认为这证实了他的信念：专制政体具有“国粹性”，超等级性，能够拯救俄国摆脱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不能忘记，不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还有民粹派，在晚得多的时候——在九十年代！——也还把农奴制改革看作是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他们所根据的理由，据说这次改革使“分配生产资料给生产者”法定化起来，核准了“国民生产”，这是跟资本主义生产不同的东西。可是，按照列宁的定义，农奴制改革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农奴制度的（或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的插曲之一”^②。列宁指出，“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③。

① 小说《白痴》里的主人公。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92页。

③ 同上，第9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期待用这个正在转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国的机构来抵制资产阶级！无怪在他的意识里，他心爱的主人公是跟“愁容骑士”①十分相似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违反他所固有的讽刺才能，结果竟鼓吹一种玛尼罗夫②式的牧歌境界，那显然是他自己辛辣地嘲笑过的。他在一些论文中，展开了一切等级在王座荫底下团结一致的画面，——据说，我们这里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大家可以相亲相爱，过幸福的生活。但同时，他的作品却充满着对国内资本主义化的强大过程的畏惧，他在通信中清醒地讲到乡村里的富农阶级，讲到城市里资产阶级的增强，讲到工人阶级的成长，悲痛地承认，俄国也在走和西方同样的历史发展道路（看来不曾有过任何一个艺术家，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为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痛苦。维护反动派的事业——同时又憎恶构成反动派阵营的统治阶级！所有这些矛盾都标志出：在伟大的艺术家的创作中，现实生活和虚伪的反动公式进行着斗争。

以顽固反动驰名的政论家列昂季耶夫，贵族阶级的颂扬者，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在他看来，《作家日记》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一切艺术作品不可估量地珍贵得多。这是敌人的很重要的供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里宣传他的反动观点，但在艺术作品中，“除此以外”，他还创造了艺术形象。可是，正是在艺术形象里面，暴露出艺术家的具有现实矛盾的整个灵魂和他的真正的世界观，而在政论中，有时只可能表现世界观的“被修剪过的”、被熨平过的、跟矛盾人工地隔离开来的某一方面。杜勃罗留波夫卓越地发挥了一种意见，认为艺术家的世界观必须求之于他所创造的形

① 即指堂·吉珂德。

② 果戈理的《死魂灵》里的一个人物。

象，并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一意见光辉地应用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分析里面去。

到了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出入沙皇宫廷，受到大公们的宠爱，其中包括皇太子，未来的“警察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他成了贵族反动派领袖、“宗教事务院”的检察总长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①的朋友，这人是平民出身，后来变为俄国一切生气勃勃的纯洁的事物的凶恶毒辣的绞杀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从这个沙皇奴隶总管的带有宗教味道的甜言蜜语的劝告，写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卓夫兄弟》。波别多诺斯采夫在给伊·阿克萨柯夫^②的信里自夸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他的指示构思了左西玛这个人物。《卡拉马卓夫兄弟》的作者认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狠狠地打击背神的革命阵营，“虚无主义”^③阵营。可是他在这部小说里，却通过可厌的老头子费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卓夫，创造出了地主阶级极端腐化的形象。而在斯美尔佳科夫的形象里，作家又深入骨髓地咒骂了各种各样的奴才性——贵族方式的产物和反映。这两个形象都是世界文学的典范性的成就。

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象列昂季耶夫之流的先生们为什么偏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论而不喜欢他的艺术作品。反动派对艺术的态度就是这样：他们害怕艺术，因为他们害怕真理。艺术在本质上，不愿意为反动派服务，因为它跟虚谎是不能相容的。真理和虚谎的斗争，贯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创作。

当列昂季耶夫在长篇小说《少年》里出乎意外地发现有一处对贵族阶级说了几句比较恭维的话的时候，他是怎样地高兴，用陀思

① 波别多诺斯采夫(1827—1907)，反动政治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宠臣，曾推行书报审查及其他许多压迫进步舆论的反动措施。

② 伊·阿克萨柯夫(1823—1886)，斯拉夫派诗人。

③ 当时的反动派习惯于把民主革命运动称为“虚无主义”。

妥耶夫斯基的说法，甚至是怎样地“喜欢得尖声叫起来”啊！但这几句话是一个极不重要的人物说的，并且讲的不是现在和未来，而是讲的辽远的、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照这一段话的全部意义和上下文语气看来是如此——并且是在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描写贵族阶级的道德堕落及其对钱袋权力的投降！正象乞丐因为找到了不能吃的冷羹残肴而高兴一样，列昂季耶夫也因为一般在否定态度描写贵族阶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并且恰巧是在一部否定的描写特别有力的小说里，找到了一些有利于贵族阶级的东西而高兴！必须承认，并不愚蠢的列昂季耶夫，在文章的这个处所，正象一个被人侮蔑而还洋洋得意的傻瓜一样……然而他精明强干地企图在这里取得阶级利益：据说，如果连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贵族阶级身上看到一些肯定的东西，那么，请重视贵族阶级吧！保护并增加他们的特权吧！我们讲到这个插曲，不仅因为它可笑，并且也因为有着值得注意的特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远没有充分发挥他所具备的作为一个叙事诗艺术家、社会小说家的才能，这种艺术家把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艺术地研究社会过程和支配人的行为的社会动机，列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些才能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是因为作家力图通过一个孤独的人的与外界隔绝的灵魂，并且还是病态的灵魂，来对现实加以主观的臆断。然而，在这种极端个人的、主观主义心理学的臆断中，艺术家还是提出了重大的社会主题，——例如资产阶级超人的问题——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里的拿破仑式的主题，《少年》里的洛希尔式的主题，资产阶级不道德行为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动摇不定的、中等社会地位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做刽子手还是做牺牲者”的难题，以及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社会问题。

他的主人公把新社会的道德法则和规格“应用”到自己身上，“试图”成为这个社会里的一个真正的人——但越是深刻地感觉内

心倾向于“蜘蛛般的”、残酷的、巧取豪夺的原则，就越是恐惧而激动地躲开那正在战胜他的诱惑。他企图在教会的荫底下摆脱这些可怕的引诱，准备完全拒斥、断然背弃用黑暗地狱威胁着他的那颗自己的灵魂，——只要能够避免染上恶习就行！可是，本质上是空幻的、虚妄的宗教的“借口”，无法使人避免看到蜘蛛、毒蜘蛛、蜈蚣的丑恶，甚至一些特别的、仿佛故意制造出来的、极端可厌的虫子，象在小说《白痴》里，出现在伊波里特的显然是精神病的噩梦里的爬虫的丑恶。敌视整个人类的现实在人的灵魂里所产生的一切凶恶的、残酷自私的东西，在作家的意识里，是跟丑恶的虫子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怀着环境不如意的感觉活在世上。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现实；社会孤独感的主题是作家的作品中最重要主题之一。——（人无路可走！马尔美拉多夫这一句悲剧性的绝叫，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苦闷，表现出他笔下中等地位的主人公的社会心理自觉中的主要的东西。）在这句话里，彻响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一个更为广泛的主题，这个主题的意义就是：一般环境总是不如人意。他在创作事业的第一时期中，企图从社会观点上来解决这个主题；在第二时期中企图把它转移到神秘的“来世的”范围里去，据说人的灵魂只有在那里才能够找到合适的“环境”。因为据说只有“在那里”才能显出这个灵魂的超凡的本质；而在罪孽深重的尘世，连“人的天性”本身也是跟“神的”理想对立的。当然，这种形而上学的解决即使在创作发展的第二时期中，也没有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安下心来：他的社会良心太敏锐——按照高尔基分析，这是病态的良心。宗教的解决，只是意味着一种企图，即使是微弱的烛光，也要用来照亮灰心绝望的层层黑暗。在形而上学地解决社会主题的倾向中，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神秘化和对社会现实加以臆断的主观主义，这种情况跟

他的创作的现实主义意向发生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主人公灵魂中对资产阶级掠夺行为的诱惑与毒素的迷恋，以及对这些诱惑与毒素的憎恶这二者之间的斗争，在他的作品中，是被当作魔鬼和神为争夺人的灵魂而进行的永恒的斗争来解释的。主人公的社会的、心理的内心分裂，被视为同一形而上学的斗争的表现；“在尘世”，斗争双方的力量是相等的，这对于人，强大情欲的盲目而毫无防御的玩物说来，真是不幸和诅咒。内心分裂是人身上的永恒的、本质上固定不变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这斗争在“尘世的”褊狭的理智和感情的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这也就是卡拉马卓夫式的“同时对两个深渊的观照”^①，同一个灵魂中“圣母的理想和所多玛^②的理想”的痛苦的结合，——“宿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人的灵魂中善与恶的斗争之所以这样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笔下的人物，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据这样重要的位置，是因为这斗争跟他全部创作的一个根本主题密切相联的缘故。实际上，那就是旧的、权威性的、社会的与道德的规范和约束在过渡时期中土崩瓦解的主题，对资产阶级不道德行为和厚颜无耻的畏惧，对资产阶级的卑劣下贱和兽性利己主义的畏惧。变化多端的危机时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丧失道德标准的可怕的时期，是一切都有“自由”，干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神圣事物都有“自由”的时期。正是在这一点上，并且仅仅在这一点上，包含着跟拉斯柯尔尼科夫、德米特里·卡拉马卓夫、伊凡·卡拉马卓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其他许多人物的形象有关的一切问题的客观意义和重要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现实主题，往往好象是以一种隐语的、

① 两个深渊系指善与恶。

② 以色列的一个古代城名。据《旧约·创世记》记载，该城是因为罪孽深重而被上帝毁灭的。

神秘化的形式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神秘化倾向特别是表现在：作者往往混淆社会对象。他违背形象的客观社会心理本质，粗暴地把一些完全跟他不适合的特征和特质强加在他身上，目的是为了故意要把阴险恶毒的“虚无主义者”羞辱一场！实际上描写的是各式各样地主的和资产阶级的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者，社会流氓，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力图把他们说成是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①形象所代表的那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社会对象的混淆还表现在这件事上：作者把在客观本质上十分反动的、根本是敌视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行为和动机“偷运”到革命阵营里去。作者想叫斯塔甫罗庚^②之流无耻之徒和品行不端的人，变节负义者，社会解体的产物，或者拉斯柯尔尼科夫之流垂涎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放纵行为”的人，穿上这样的外衣，以便这些人可以隐隐约约使读者联想到无神论者，革命家。可是，虚幻的外衣从这些人物身上剥落了，他们显出了真正的社会本质。

在这社会对象的混淆里面，表现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非常特征的一点：他把一切历史上新的、代替旧事物的事物一概不加区别地、故意歪曲地一视同仁，混为一谈，把一切新的事物当作和资产阶级同样的东西而加以反对。他在旧事物中看到很少好东西，这只有更加突出作家的社会政治立场的绝对空想性而已。他把人民的“顺从”理想化（在拉辛们和普加乔夫们^③的国家里！）——认为这是精神的纯洁，是抵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傲慢”，抵制兽性利己主义的猖獗的支柱。

（“从头起”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地否定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

① 巴扎罗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里的主人公。

② 《恶魔》里的一个人物。

③ 拉辛（死于1671年）和普加乔夫（约1742—1775）都是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结果均遭沙皇反动政府惨杀。